

「古例・新詮」——
春秋時期齊魯「夾谷之會」的跨域探析
“Ancient Case, New Interpretation”—
**The Exploring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of the Qi-
Lu Jiagu Meeting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葉定國

Yeh, Ting-Kuo

Author's Correspondence Information

作者通訊

葉定國 Yeh, Ting-Kuo

Associate Professor

Air Forc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副教授

No. 198.Jieshou W. Rd., GangshanTownwhip, Kaohsiung County 82047,

Taiwan (R.O.C.)

E-mail: ydktw0314@gmail.com

摘要

傳統解讀春秋時期齊魯「夾谷之會」多以孔子以禮義全魯服齊為主要結論，作者另由國際關係現實主義觀點出發，結合傳統文獻分析及社會網絡分析方法，以跨域研究（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或稱科技整合）的角度重新檢視此一歷史事例。研究發現，魯國夾谷會後取得汶陽之田並非全然有益於齊魯之間的外交互動，魯國反而可能因此失去更多外交籌碼。「夾谷之會」其實是春秋時期複雜政治利益交換和霸主國家權力爭奪的縮影，並非齊魯兩國單純的雙邊外交活動。

關鍵字：夾谷之會、社會網絡分析、春秋時期、齊、魯

「古例·新詮」—— 春秋時期齊魯「夾谷之會」的跨域探析

夏，公會齊侯於夾谷。公至自夾谷，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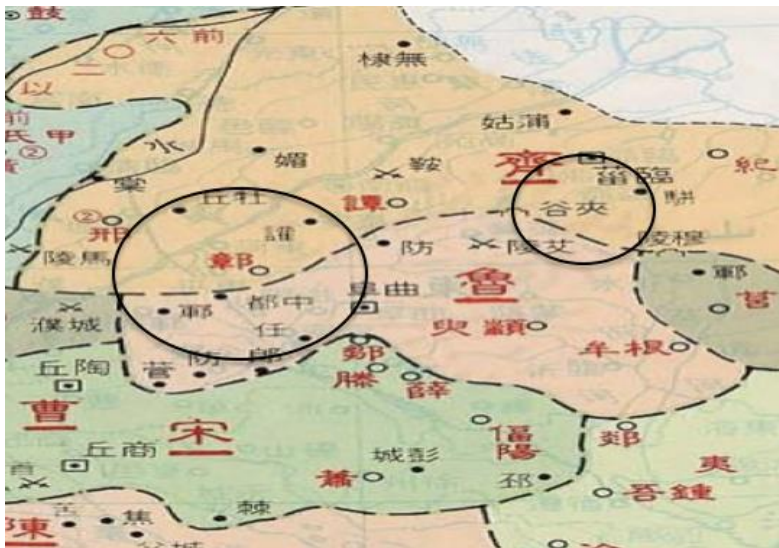


圖1 齊魯交界地²

壹、前言

「春秋末年，諸國之間的對抗是仰賴道義還是實力？各國會因道義或是禮法原則而放棄政治上的現實利益嗎？」

魯定公十年（500 BC），齊魯兩國會盟於夾谷，齊景公本欲藉機挾持魯定公，但輔佐魯君與會的孔子據理力爭，不僅在文事上以禮法與齊國周旋，在武備上也備齊兵馬以備不時之需。結果不僅使魯國與齊國在會盟時得以維持平等地位，其後齊國

¹ 《春秋·定公十年》。

² 黎東方：〈中古上古史八論——齊魯交界地〉，《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4，2018.5.31。網址〈<https://kknews.cc/history/mmaq8gg.html>〉。

更自行歸還侵佔魯國的領地，這便是著名的「夾谷之會」。陳岳在《春秋折衷論》中便說：「齊，強國也，魯弱國也，以力爭之不可也，以勢競爭不可也，惟可以義服之，聖人用是，而齊沮其謀，反其田。」³

「夾谷之會」是魯國在齊強魯弱外交格局中重大的外交勝利，歷來認為「夾谷之會」不僅證明孔子卓越的外交能力，也是代表春秋時期禮義原則戰勝強權政治⁴及歷來對於孔子「聖人」形象詮釋的重要例證。⁵但在經歷西周犬戎之禍及王綱解構的歷史巨變之後，東周時期封建體制已瀕臨崩潰，時至孔子相魯時已近春秋末年，諸侯國家對於周天子地位和封建制度的認同更是一落千丈，違法僭禮的情況層出不窮。在這樣一個背信棄義，王權沒落、利益掛帥的政治氛圍下，齊國有可能僅因受挫於孔子的禮義法則便歸還侵佔魯國的土地？抑或齊國在「夾谷之會」的背後有更深層的外交計算和謀略？根據古今中外的歷史經驗，現實利益的獲取是外交互動中最重要的目標之一，特別是在缺乏國際規範和各國相互制衡機制的情況下，這種情況更為明顯。如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現實主義學派（realism）便認為國家所處的國際社會是一種無政府狀態（anarchy），在理性和趨利假設之下，國家間會運用各種方式和手段獲取維護自身安全所必須具備的資源，特別是物質條件，必要時候會採行軍事行動。因此外交互動中勢必圍繞著「物質利益」、「軍事行動」和「安全條件」等關鍵因素。⁶以此觀之，單靠以薄弱封建禮法為基礎的道義政治，在春秋末年能否產生決定性的政治影響，當有值得重新審視之處。

魯國以禮治國，根據歷史記載魯國確實多次因崇奉周禮使國家轉危為安。如：

齊桓公問：魯可取乎？仲孫湫答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⁷

³ 胡楚生：〈陳岳春秋折衷論析評〉，《經學研究集刊》，第6期，2009.5，頁87。

⁴ 有關孔子以禮服齊，取得外交成就的說法歷來文獻記載頗多，如家鉉翁：《春秋集傳詳說》，第158冊，第27卷，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2005，頁471。應劭：《風俗通義校注》，王利器注，臺北：漢京文化，2004，頁315-16。鄭玉：《春秋闕疑》，吉林：吉林圖書集團，2005，頁130-31。陳捷：〈孔子之戰爭觀管窺〉，《先秦諸子與戰爭倫理》，羅秉祥編，香港：中華書局，2016，頁109-38。

⁵ 有關於孔子聖人形象的討論可參閱李隆獻：〈先秦漢初文獻中的「孔子形象」〉，《文與哲》，第25期，2014.12，頁24-25。及李文文中引述之朱曉海：〈孔子的一個早期形象〉，《清華學報》，第32卷，第1期，2002.6，頁27。伍振勳：〈聖人敘事與神聖典範：《史記·孔子世家》析論〉，《清華學報》，第39卷，第2期，2009.6，頁253-54。葛兆光：〈在歷史與解釋之間——對《谷梁傳》定公十年夾谷之會記載的詮釋史〉，《北京語言大學——中國文化研究》，第1期，2005.3，頁6。

⁶ 研究者在此提出西方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的觀點並無意超越東西方在歷史發展上的時空差異，但研究者認為不論東西方的政治實體，即便存在詮釋其政治行為的不同觀點，但追逐國家安全和利益的立場並無二致，這是國家存在的核心價值之一，無論古代和當代皆是如此。有關西方國際政治現實主義的理論觀點可參考 Morgenthau, H., *Politics among Nations*. New York: McGraw-Hill, 1985. 4-16。倪世雄：〈第六章〉，《當代國際關係理論》，臺北：五南圖書，2010，頁217-65。

⁷ 《左傳·閔公元年》。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臺北：洪葉文化，1993，頁257。

秋，齊侯侵我西鄙，……。」

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而討有禮者，……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⁸

魯好義而民戴之，好義者安，民戴者和，伯禽之治存焉，故不可攻。攻義者不祥，危安者必困。⁹

上述的記載都是魯國因重禮而避禍的歷史記載，有學者認為魯國在春秋時期相對於齊國來說是一個較為弱小的國家，但魯國得以抗衡強齊主要就是靠禮的依持。即便春秋時期禮法衰微，但仍舊是對內團結國家，對外抗衡霸權的重要憑藉。¹⁰

但對於魯國崇禮的觀點亦有學者提出不同看法，有學者認為所謂「周禮在魯」實際上是一種二元論述，因為一方面魯國雖崇禮，但另一方面魯國弑君、出君及違背喪禮和盟會禮節的情況也很嚴重，這與魯國重禮的既定形象明顯不同。因此認為所謂「周禮在魯」的論述實際上是「禮學在魯」，一方面指的是魯國比較完整的保存了有關周禮的典籍和制度，另一方面則是說明春秋之後禮學在魯國興起的情況，並非全然指魯國是尊禮和崇禮的國家。¹¹ 因此齊魯的「夾谷之會」，除歷代稱頌孔子以禮服齊的說法之外，對於春秋大義亦有學者認為是後人過度解讀史例的結果。如宋代朱熹便多次提出這樣的觀點：

「孔子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是九世不復讎也。此說如何？」曰：「謂復百世之讎者是亂說。……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美惡人自見。後世言春秋者，動引讎、美為言，不知他何從見聖人讎、美之意。」¹²

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霸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¹³

問夾谷之會，孔子數語，何以能卻萊人之兵？曰：「畢竟齊常常欺魯，魯常常不能與之爭，卻忽然被一箇人來以禮問他，他如何不動？如藺相如秦王擊缶，亦是秦常欺得趙，忽然被一個人恁地硬挺，他如何不動？」¹⁴

⁸ 《左傳·文公十五年》。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臺北：洪葉文化，1993，頁 614。

⁹ 《晏子春秋·內篇問上》。石磊：《晏子春秋譯注》，哈爾濱：黑龍江人民，2003，頁 52。

¹⁰ 對於禮制在左傳中的運用，可參考張端穗：《左傳思想探微》，臺北：學海，1987。王琮瑄：〈由左傳交際涵養與外交辭令論「禮」——兼論交際失敗之例〉，《中國學術年刊》，第 39 期，2017.9，頁 27-52。

¹¹ 畢經緯：〈論周禮在魯國的二元界定〉，《殷都學刊》，第 4 期，2011.11，頁 18-22。

¹² 《朱子語類·本朝七·夷狄》。朱熹：《朱子語類》，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臺北：中華書局，1986，頁 3198。

¹³ 《朱子語類·春秋·綱領》。朱熹：《朱子語類》，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臺北：中華書局，1986，頁 2144。

¹⁴ 《朱子語類·春秋經傳附》。朱熹：《朱子語類》，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臺北：中華書局，

朱熹認為對於春秋的美善褒貶是後人「動引譏、美為言」，並非是春秋直書其事的本意。而孔子可以說退齊國，是運用禮制為工具，結合外交談判技術，在齊國猝不及防下所得到的意外成果。清朝姚際恆於《春秋通論》中也認為：

「孔子相齊值齊魯交平，歸田服義不可謂非……左氏所載孔子使茲無還劫反汶陽之田事，以匹夫之勇誣聖人決不可信，而豎儒謂夫子自序其績更不值一哂。¹⁵」

姚際恆雖然認為「歸田服義不可謂非」，但對於孔子在「夾谷之會」中的表現過度吹捧也沒有必要。特別是對於孔子指派茲無還談判返回汶陽之田更是不可信之事，他認為齊國返汶陽之田是當時齊魯交平必然發展的結果。

李隆獻教授也認為「夾谷之會」中對於「汶陽之田」的爭奪不單是齊魯之間的外交問題，更牽扯到衛、晉、楚等國勢力消長的複雜關係。所以「夾谷之會」雖說是修齊魯「舊好」，但其中可能有更多「舊怨」待解，兩國之間的互信基礎明顯不足。¹⁶ 因此「夾谷之會」中禮義原則的運用雖然突顯了孔子重禮的態度，但也突顯出魯國在道義政治和外交現實中的衝突和矛盾，也顯示出禮法原則運用已經不是文化表現，更有明顯的工具主義¹⁷ 傾向。

由上述的分析中可以初步理解，「夾谷之會」的歷史結果雖是孔子以禮服齊使魯國取得汶陽三邑，但過度放大禮法原則在實際政治中運用的結果，卻可能掩蓋了其中的現實利益考量與操作。下文將由現實政治利益獲取大於道義禮法規範考量的觀點假設出發，以歷史文獻分析（historical document analysis）為基礎，特別集中於《春秋三傳》和《國語》有關齊魯「夾谷之會」相關記載，以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的觀點和社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的方法，以跨域整合

1986，頁 2171。

¹⁵ 《春秋通論·卷十四》。姚際恆：《姚際恆著作集——春秋通論》，林慶彰主編，臺北：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4，頁 297。

¹⁶ 李隆獻：〈先秦漢初文獻中的「孔子形象」〉，《文與哲》，第 25 期，2014.12，頁 24-25。

¹⁷ 工具主義（instrumentalism）或稱為實驗主義（experimentalism），是美國哲學家杜威（John Dewey）建立起來的哲學體系，強調觀念或知識是解決問題的工具，不只是思想的結構而已，亦即知識的形成有其目的性和實用性。詳見徐宗林：〈工具主義〉，《教育大辭書》，2000，2018.11.2，網址〈<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02185/>〉。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¹⁸ 的角度重新解讀此一史例，以嘗試探析在「夾谷之會」中齊魯兩國可能隱含的政治操作。¹⁹

貳、齊魯交往的歷史經驗

西周周王室分封天下，齊和魯都是東方的大國，兩國毗鄰而立，在經濟、政治和文化社會各個層面關係密切，也造就了兩國長期既合且戰，若即若離的外交關係。春秋時期齊魯兩國外交關係的發展可以以齊桓公成霸做為區隔，分為前後兩期。²⁰

一、齊桓公稱霸之前

齊桓公成為春秋首霸的時間是魯莊公十五年（679 BC），齊桓公在管仲的協助之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由弱轉強，成為春秋時期的第一位霸主。在此之前，齊魯國力在伯仲之間，因此齊國多與鄭、魯等國結盟以應對外交事務。而春秋前期魯國勢力尚強，加上和周天子的特殊關係（魯國為周公旦的始封之國），許多國家都對魯國進貢，由此可知春秋初期魯國地位得到諸侯普遍認可。²¹ 如：

「秋，七月，杞侯來廟，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²²

「十四年，春，會于曹，曹人致饋，禮也。」²³

但其後兩國因處理紀國的問題埋下衝突的因子。紀國近齊，齊國長期有侵奪紀國的野心。加以齊哀公因紀侯譖於周王室而受烹，使齊國因此經歷很長的混亂情況，齊紀兩國也因此種下世仇心結，紀國對此情況知之甚詳。如：

¹⁸ 根據國家教育研究院對於定義，所謂的跨域整合或是科技整合（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在社會科學上的意義是指「社會科學內的科際整合應該是建基於一種超越主體性（Transsubjektivität）的基本原則，從日常語言中出發，重建資料的意義內涵，使各個理論與學科間能就其掌握之意義作一種對話、辯證與溝通，以期能超越主觀經驗，作出一種高層次的理解，並有助於進一步擴展對研究對象掌握之理論視野。……科際整合必須突破化約主義（reductionism）的知識靜態觀，將研究主體與研究客體都放在『生成變化』的歷程來考量，以尋求學科與學科之間、理論與理論之間的對話及溝通。」詳細定義可參考方永泉：〈科際整合〉，《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2000，2018.8.20，網址〈<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07655/?index=1>〉。

¹⁹ 葉至誠：《社會科學論》，臺北：揚智文化，2000。

²⁰ 田軍：〈春秋時期齊魯關係述論〉，《山東教育學院學報》，第119期，2007.2，頁38-41。

²¹ 如魯桓公六年，魯國與諸侯之師助齊退戎師，因此齊君特別請魯君班列諸侯序列。詳見楊伯峻編著：《春秋左氏傳》，臺北：洪葉文化，1993，頁113。

²² 《左傳·桓公二年》。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臺北：洪葉文化，1993，頁90。

²³ 《左傳·桓公十四年》。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臺北：洪葉文化，1993，頁139。

「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²⁴」

新仇舊恨交雜之下，齊侯早有奪紀之心，紀國對於強齊謀已知之甚詳，因此積極尋求魯國的協助以制衡齊國，因此在齊僖公時期展開積極的外交活動，不僅和魯國結成甥舅之國，同時更藉此關係調停魯國和莒國的矛盾，魯、紀及莒三國建立了同盟關係，對於齊國的擴張計畫形成了重大的阻礙。但是魯國助紀抗齊並不是基於道義責任，主要仍是考量外交利益。

魯桓公十七年（695 BC），魯桓公在「黃地」會見齊侯和紀侯，希望能調合兩國的爭端，但是無功而返。次年魯桓公「薨于車」²⁵，魯國因此陷入混亂，無力助紀抗齊，紀國因此被齊國併吞，齊國滅紀是齊魯國力消長的重要轉折點。除了紀國問題之外，魯莊公八年（685 BC），齊魯兩國再因圍郕國有所衝突，魯莊公之弟仲慶父更計畫攻打齊軍，但被魯莊公勸阻，魯國在外交上的舉棋不定，喪失了和齊國周旋的能力和時機。²⁶ 此後齊國在外交上咄咄逼人，魯國節節敗退，春秋初期兩國的友好關係逐漸被軍事衝突所取代，兩國自此也建立了外交上的主從格局。

二、齊桓公稱霸之後

桓公即位初期，魯國尚期待運用其影響力聯盟其它國家共同對抗齊國，但招致齊國聯宋、陳兩國伐魯，因此魯國由抗齊策略改採聯齊策略，積極和齊國發展外交關係，並藉此提昇國力。而齊國在軍事上一時無法屈服魯國，同樣希望採行外交策略壓制魯國，因此先後召開「北杏」和「鄆」兩次盟會，以諸國聯盟的方式逼服魯國。²⁷ 最後在魯莊公十三年，齊魯召開「柯」之盟，標示了魯國對於齊國的屈服。解決了魯國之患後，齊國進一步逼服宋國，自此齊國周邊國家無力對抗齊國，齊桓公便在魯莊公十五年稱霸，齊魯關係至此進入了新的時期。

其後齊魯之間的關係分分合合，桓公在位稱霸時期，魯國一方面無力與齊國全面對抗，一方面齊國尊王攘夷的外交政策對於魯國的安全和國際地位有一定程度的幫助，因此在齊桓公勢力全盛時期，魯國選擇和齊國合作，兩國不僅沒有軍事衝突，更有聯姻關係。其後魯國更是積極的參與齊國召開的各種盟會，在魯莊公和魯僖公時期，魯國共參與齊國主持的盟會十次之多。²⁸ 由此可知此時兩國關係的密切。

²⁴ 《左傳·桓公五年》。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臺北：洪葉文化，1993，頁104。

²⁵ 亦有學者認為此事件是齊襄公因與文姜的私情為魯桓公所知，故決定殺死魯桓公。詳見薛向群：〈論春秋初期齊魯爭奪紀國的鬥爭及其結局〉，《學海》，第2006卷，第5期，2006.10，頁206。

²⁶ 同註20，頁38。

²⁷ 齊桓公即位初期便和魯國爆發「乾時之戰」和「長勺之戰」，但都無法有效擊敗魯國。詳見註20，頁38。

²⁸ 魯莊公二十七年的幽之盟，魯僖公元年的檉（宋地，今河南淮陽西北）之盟、三年的陽谷（齊地，

桓公歿，齊國陷入內亂，加以晉、楚、吳等國崛起，齊國稱霸局面不再，此時魯國依違多方，但求在霸權侵逼中維持國祚。至齊景公即位，為求恢復齊國的霸主地位，對於魯國展開積極的外交爭取。希望可以透過聯盟魯國來抑制晉國的稱霸，同時對抗南方逐漸興起的吳國，這便是齊魯「夾谷之會」的歷史背景。

參、「夾谷之會」的原因與史記載

一、夾谷之會的原因

根據史載，夾谷之會有兩個重要原因。第一是齊國對於魯國任用孔子的憂慮，如：「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于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于夾谷。魯定公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²⁹」「四十八年（齊景公四十八年，魯定公十年），與魯定公好會夾谷。……景公害孔子相魯，懼其霸，故從黎鉏之計。³⁰」

從上述的記載可以得知，齊國非常忌憚魯國任用孔子。《史記·孔子世家》提及：「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³¹。當時魯國內部面臨了陽虎和公孫不狃的動亂，主政的季桓子資歷尚淺、體弱多病，而魯定公也是初立，不論執政經驗和能力都不足，因此魯國出現權力真空的狀態。³²在季桓子的認可之後，孔子協助魯定公穩定魯國政局，成績斐然。「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費飾賈，男女行者別於途，途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並矣，盍致地焉？³³」

今山東陽谷北）之盟、五年的首止（衛地，今河南睢縣東南）之盟、七年的寧母（魯地，今山東魚臺境內）之盟、八年的洮（今山東鄆城西南）之盟、九年的葵丘（今河南蘭考東）之盟、十三年之咸（今河南濮陽東南）之會、十五年的牡丘（今山東聊城東北）之盟、十六年的淮（今江蘇盱眙）之會。詳見註 20，頁 39。

²⁹ 《史記·孔子世家》。司馬遷：《史記·世家》，王利器、張烈等譯注，臺北：臺灣古籍，2003，頁 939-41。

³⁰ 《史記·齊太公世家》。司馬遷：《史記·世家》，王利器、張烈等譯注，臺北：臺灣古籍，2003，頁 98-99。

³¹ 司馬遷：《史記·世家》，王利器、張烈等譯注，臺北：臺灣古籍，2003，頁 938。

³² 魯定公五年，季桓子任魯國上卿，掌握魯國執政權力，但內部情勢極為不穩。季桓子的家臣陽虎和公孫不狃先後反叛，並囚禁魯定公。在季桓子無法有效執政的情況之下，定公以孔子代行職權，先任中都宰，後任司空和大司寇，魯國內部混亂的情勢得以穩定下來。詳見王恩來：〈孔子相魯考〉，《理論界》，2010 卷，第 1 期，2010.1，頁 131-32。

³³ 《史記·孔子世家》。司馬遷：《史記·世家》，王利器、張烈等譯注，臺北：臺灣古籍，2003，頁 944。

顯然孔子的政績使齊國感受到威脅，因此齊國大臣黎鉏說：「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³⁴

由此可知，齊國對於魯國日益強大深感憂慮，因此如何破壞魯君對孔子的信任，削減孔子的權力使其無法全力執政，藉此弱化魯國，是齊國對魯國外交政策上的重要考量，而若無法達到目標，「則致地」是最後運用的策略，由此可知，致地魯國是齊國原本規劃的外交策略之一。

第二是當時齊魯兩國的外交考量，就齊國而言，「夾谷之會」的原因之一是齊景公希望聯合魯國對抗來自南方吳國的威脅，並藉此恢復齊國的霸業，齊國對於魯國的外交策略是基於稱霸中原戰略的考量，不只是單純的兩國外交之爭，其本意不僅是齊魯相盟，更不希望魯國在齊吳兩國的競爭中倒向吳國，威脅齊國復霸的目標。

再就魯國而言，魯國強卿勢盛，侵逼公室是魯國政治的常態，昭公時期還曾出現三桓「四分公室」、「季氏出其君」的政治事件，定公時期三桓雖將若干政治權力交給魯君，但公室和強卿之間的矛盾仍在，三桓勢力仍大，縱然是孔子也不能不承認這一個政治事實（孔子便曾為季桓子工作）。外交盟會活動可提昇魯君地位，藉外盟以抗衡強卿，應是合理的政治考量。就此可知，「夾谷之會」中齊魯各有外交企圖。

二、「春秋三傳」與《史記》中對於「夾谷之會」的記載與詮釋

對於魯定公十年「夾谷之會」一事，「春秋三傳」（《左傳》、《公羊傳》、《春秋穀梁傳》）皆有記載，但三傳筆法各有不同，對比三傳說法，其中也透露出若干對於會盟不同的解讀觀點。而其後在西漢的司馬遷的《史記》中，對於夾谷會盟的記載和春秋三傳的筆法和記載又有所不同：

（一）「春秋三傳」之記載

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

³⁴ 司馬遷：《史記·世家》，王利器、張烈等譯注，臺北：臺灣古籍，2003，頁945。

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³⁵

夏，公會齊侯於頰谷。公至自頰谷。離會不致，何為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為危之也。其危奈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噪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在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³⁶

夏，公會齊侯于頰穀。公至自頰穀。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齊人曷為來歸鄆、謹、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歸之。³⁷

對照上述「春秋三傳」有關魯定公十年「夾谷之會」的記載，有其異同之處：

- (1)《左傳》長於敘事，記載孔子在「夾谷之會」中如何以禮服齊的過程最為詳細，但文中最後記載是「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並沒有明確說明齊歸魯地是否是因為孔子以禮服齊，據理力爭抑或是兩國結盟的結果。
- (2)《春秋穀梁傳》也記載孔子以禮服齊的過程，但相較於左傳則較為簡單，論述的重點也所不同。其記載「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在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這裡的「此」字可以較為明確的解釋會盟過程中孔子的表現是齊歸魯地的主因，但卻特別言明會盟文事必具武備，《春秋穀梁傳》的記載說明孔子雖以禮服齊，但在武事上的準備才是會盟得成的重要原因。
- (3)《公羊傳》的記載更為簡短，會盟過程完全不論，但「齊人曷為來歸鄆、謹、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歸之。」則明言孔子行於季孫，季孫氏對於孔子言聽計從，這是齊國歸還魯地的主要原因，並非由於孔子在會盟時的表現。

(二) 司馬遷《史記》及其它著作中有關夾谷之會的記載

³⁵ 《左傳》。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臺北：洪葉文化，頁 1577-78。

³⁶ 《春秋穀梁傳》。范寧注、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 2445。

³⁷ 《公羊傳》。何休注：《春秋公羊傳》，香港：迪志文化，2001，頁 487-88。

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質。」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³⁸

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慚，乃歸魯侵地以謝，而罷去。³⁹

齊欲襲魯君，孔子以禮歷階，誅齊淫樂，齊侯懼，乃止，歸魯侵地而謝過。⁴⁰

齊侯歸，責其群臣曰：「魯以君子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翟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⁴¹

刪《詩》、《書》，定《禮》、《樂》，制《春秋》之義，著素王之法，復相定公，會于夾谷，昭舊以正其禮，抗辭以拒其侮，齊人謝過，來歸鄆、讙、龜陰之田焉。⁴²

由上述的記載可以發現，到了漢代，司馬遷明確的將孔子以禮服齊和其後齊國歸還魯地相互連結，直指孔子在會盟時的表現便是導致齊國謝過而歸還魯地的原因，《孔子家語》及《風俗通義》則是延續司馬遷的論述而有同樣的說法。但考諸「春秋三傳」的記載，即便史記言簡意賅，但這樣的連結並非清楚如實的反映三傳記載的內容。如《春秋穀梁傳》的記載認為孔子會盟時的表現是齊歸魯地的重要原因，但也提及軍事武備的實力條件或許才是會盟成功的主因。而《左傳》記載齊歸魯地是齊魯利益交換的結果，並非全因孔子的表現而無償取得。而公羊傳的記載中則顯示齊國歸還魯地和孔子會盟時的表現無關。這與史馬遷《史記》的記載的筆法顯有不同，或言漢代尊儒，溢美孔子聖德，因此忽略了實力條件與利益考量在外交關係中的重要性。

夾谷會後齊人歸還讙、讙、龜陰之田，如果齊國並非全因孔子會盟的表現而歸還魯地，那究竟齊國的外交考量為何？這必須就讙、讙、龜陰等汶陽之田在齊魯兩國往來易手的歷史過程中進行分析。

³⁸ 《史記·孔子世家》。司馬遷：《史記·世家》，王利器、張烈等譯注，臺北：臺灣古籍，2003，頁940。

³⁹ 《史記·齊太公世家》。司馬遷：《史記·世家》，王利器、張烈等譯注，臺北：臺灣古籍，2003，頁98-99。

⁴⁰ 《史記·魯周公世家》。司馬遷：《史記·世家》，王利器、張烈等譯注，臺北：臺灣古籍，2003，頁168。

⁴¹ 《孔子家語》。王肅：《孔子家語》，北京：源記書莊，1926，頁2-3。

⁴² 《風俗通義·窮通》。應劭：《風俗通義校注》，王利器注，臺北：漢京文化，2004，頁315-16。

肆、讎、鄆、龜陰等「汶陽之田」的往來易手

根據孔穎達《五經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定公十年》中記載，「此三邑皆汶陽田也……此三邑皆在汶陽北近齊……。陽虎出奔取為己用，今服義而歸魯也」⁴³。而杜預亦云：「三邑，皆汶陽田也」⁴⁴。「汶陽之田」位於齊魯兩國邊境，不僅土地肥沃，對於兩國來講更具有重要的國防意義，因此長久以來齊魯兩國便圍繞著「汶陽之田」展開長達百年的外交和軍事競逐。



圖 2 古「汶陽之田」現圖⁴⁵

「春秋三傳」中有關汶陽之田的相關記載：

- (1) 莊公十三年 (681 BC)：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

⁴³ 杜預注、孔穎達疏：《四部備要·春秋左傳正義》，第 56 卷，臺灣：中華書局，1966，頁 1。

⁴⁴ 同註 43。

⁴⁵ 楊伯峻編著：《定公十年》，《春秋左傳注》，臺北：洪葉文化，1993，頁 1576。根據考定，汶陽之地約在山東省汶河以此泰安市西南。為春秋魯地，而「鄆」、「讎」及「龜陰」等地皆包含於汶陽之地附近。此圖為筆者參考龐小霞、王芬、朱繼平、高江濤：〈汶河流域田野考察記〉，《中國考古》，2016.8.5，2019.5.31，網址〈<http://www.kaogu.cn/cn/kaoguyuandi/kaogusuibi/2016/0805/54952.html>〉。百度百科：〈魯長城〉，《百度百科網站》，2018.6.11，2019.6.31，網址〈<https://baike.baidu.com/item/魯長城>〉。半島網新聞：〈萊蕪發現首座魯長城，距齊長城遺址僅 70 公里〉，《半島新聞網站》，2009.5.11，2019.5.31，網址〈http://news.bandao.cn/news_html/200905/20090511/news_20090511_826698.shtml〉等資料並結合 Google 地圖系統繪製而成。

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柯之盟。⁴⁶

(2) 僖公元年 (659 BC)：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⁴⁷

(3) 文公十七年 (610 BC)：齊國伐我北鄙。⁴⁸

(4) 成公二年 (589 BC)：取汶陽田。⁴⁹ 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鄆。⁵⁰ 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取汶陽田。⁵¹ 取汶陽田。汶陽田者何？鞍之賂也。⁵²

(5) 成公三年 (588 BC)：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⁵³ 秋，叔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⁵⁴ 秋，叔孫僑如率師圍棘。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⁵⁵

(6) 成公八年 (583 BC)：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⁵⁶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於齊，緩辭也，不使盡我也。⁵⁷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來言者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⁵⁸

(7) 成公九年 (582 BC)：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⁵⁹

(8) 定公七年 (503 BC)：齊人歸鄆陽，陽虎居之以為政。⁶⁰

⁴⁶ 《公羊傳》。

⁴⁷ 《左傳》。

⁴⁸ 《左傳》。根據東周列國志記載，在此次入侵後，魯國的「汶陽之田」被齊國侵佔。次年魯宣公前往「汶陽之田」上的「平州」（泰山牟縣西）拜會齊惠公。而《左傳》中也記載「會于平州，以定公位」。由史料觀察，此時「平州」所在的「汶陽之田」，已經為齊國所有。詳見邢業友、陳巨慧、劉程程：〈春秋魯長城發現之旅〉，《文化中國——中國網》，2011.11.15，2018.5.31，網址〈http://big5.china.com.cn/gate/big5/cul.china.com.cn/lishi/2011-11/15/content_4625373.htm〉。

⁴⁹ 《左傳》。

⁵⁰ 《左傳》。

⁵¹ 《春秋穀梁傳》。

⁵² 《公羊傳》。

⁵³ 《左傳》。

⁵⁴ 《左傳》。

⁵⁵ 《公羊傳》。

⁵⁶ 《左傳》。

⁵⁷ 《春秋穀梁傳》。

⁵⁸ 《公羊傳》。

⁵⁹ 《左傳》。

⁶⁰ 《左傳》。

(9) 定公八年 (502 BC): 陽虎入於讎、陽關以叛。⁶¹

(10) 《定公十年》(500 BC): 齊人來歸鄆、讎、龜陰之田。⁶²

從上述的這些歷史記載分析,「汶陽之田」的往來易手有以下重點:

第一,從時間上來看,魯成公時期「汶陽之田」往來易手頻仍,爭奪最為激烈。從史籍的記載之中不難發現此時「汶陽之田」是晉、齊、魯、衛等國權力鬥爭的場域,雖是魯地,但卻常在強權競逐中往來易手。「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魯國土地的歸還竟要晉國協助,這也說明魯國對於此地只能仰人鼻息,無法有效統治。⁶³

第二,從封地的性質上來看,「汶陽之田」在魯國最初是魯君封賜給季友,是大夫封地,而非由魯君所掌握。季孫氏為魯國強卿,有賢名在諸侯之間。故史墨有「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的說法,更認為「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⁶⁴,暗指魯君即使被季氏所取代也並不是不可能。其後陽虎「齊人歸鄆陽,陽虎居之以為政」、「入於讎、陽關以叛」,齊人歸鄆、陽關,但卻被魯國權臣陽虎佔據統治。因此基於魯國公室與強卿之間鬥爭的政治現實,魯國權臣或強卿相較於魯君對於「汶陽之田」有更高的主控權。由此魯君對「汶陽之田」可能只有形式上的擁有權,但不具備有效管理的能力。

第三,從《公羊傳》的記載上來看,「汶陽之田」是魯國曹沫在「柯之盟」由齊桓公手中奪來,如果《公羊傳》的記載無誤,「汶陽之田」有可能本是齊地而非魯地。魯國雖曾統治 70 餘年(莊公十三年到文公十七年)。但其從魯成公到魯定公的 80 餘年,該地大都在齊國的掌握之下,時值齊強魯弱,加以去魯已久。「汶陽之田」即便爭取回來,魯國也無法對其進行有效的控制。

第四,《左傳文公十七年》有「齊侯伐我北鄙」的記載,齊國趁機侵佔魯國的「汶陽之田」。伴隨著「汶陽之田」失陷,齊魯邊界南移到了現今山東省牟汶河一線。⁶⁵「汶陽之田」歸齊大大壓縮了魯國北方邊境的防禦縱深,使魯國陷入守勢國防,也

⁶¹ 《左傳》;此為注家所稱「陽虎以鄆讎奔獻」,竹添光鴻在《左氏會箋》中便說:「是時齊多侵魯田,且陽虎以鄆、讎奔獻,魯地愈削,故使反侵地。」論見竹添光鴻:《左氏會箋》,臺北:古亭書屋,1969,頁 22。

⁶² 《左傳》。

⁶³ 關於諸國競逐「汶陽之田」的往來互動,李隆獻教授認為孔子於夾谷之會提及「汶陽之田」的用意是譏諷齊國早已失信,如何使魯國「共命」?為此田邑,齊、魯、晉三國歷經九十年的爭奪,三國之間早已無互信可言。可參閱李隆獻:〈左傳『仲尼曰』敘事芻議〉,《臺大中文學報》,第 33 期,2010.12,頁 17-18。

⁶⁴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臺北:洪葉文化,1993,頁 1519。

⁶⁵ 同註 53。

間接決定了齊魯外交上的主從格局。因此「汶陽之田」的歸屬不僅是土地的爭奪，同時也是決定齊魯外交格局中的重要關鍵。

筆者在此嘗試以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現實主義學者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所提出有關現實主義（realism）的重要命題做為檢視齊魯「汶陽之田」往來易手的理論觀點，摩根索認為：第一，政治現實主義的重要標誌是以權力定義的利益概念，亦即所謂的權力就是政治利益的獲取。第二，普遍的道德原則不能用以表述國家的外在行為，即便存在也只是在特定的時空條件，理性自利是政治中重要的原則。第三，權力定義的利益概念使可以避免過度誇大政治中的道德因素，避免政治愚蠢。

66

基於上述文獻記載並結合現實主義角度重新檢視齊國歸還汶陽之因，可能有以下的政治考量：一是《公羊傳》中對於會盟過程並沒有任何記載，它認為齊國之所以歸還魯國的地，是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意謂是由於孔子賢名方使齊國返還魯地。而根據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定公十年》記載：「僖公元年賜季友汶陽之田，季氏世脩其德，不應失其采邑。此為季氏采邑也，今復有此三邑。⁶⁷」由此可知，。而再根據唐代徐彥的《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二十六》記載：「歸濟西田不言來，此其言來者，已絕，魯不應復得，故從外來常文，……夫子雖欲不受，定公貪而受之，此違之驗。」又云：「言魯不應復得者，止以不能保守先君世邑而失之故也。⁶⁸」

根據徐彥的說法，認為即便齊國願意歸還三地，那也不過是小人之行，並非君子之義。而且這三地早就和魯國斷絕關係，形式上雖是魯地，但魯國未必可以有效統治，但定公貪心而接受了齊國歸還的土地，這種政治決定未來可能要付出更高的代價。同時齊國歸汶陽之田，名義上是還給魯國，更有可能是還給季孫氏，因此才有上述「此為季氏采邑也，今復有此三邑。」等語。如此三地歸強卿而非公室，不僅魯君無法有效管理，更可能深化魯國強卿與公室之間的矛盾，齊國背後的政治算計孔子應該知之甚深。

再根據《孔子家語·相魯第一》記載：「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⁶⁹」

⁶⁶ Morgenthau, H.. "The Six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Realism." *The Politics of Nations*. New York: McGraw-Hill, 2006. 4-16.

⁶⁷ 同註 48。

⁶⁸ 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香港：迪志文化，2001，頁 488。

⁶⁹ 王肅：《孔子家語》，北京：源記書莊，1926，頁 13。

二是根據《左傳》記載，如果齊國未來有軍事行動，齊國可以要求魯國出兵車三百乘助齊，孔子則相對要求齊國歸還「汶陽之田」以為交換條件，孔子的外交談判策略應是魯國提出歸還「汶陽之田」的條件會使齊國知難而退。但當齊國答應返還「汶陽之田」後，齊國未來如果要求魯國在征伐中提供軍事協助，則魯國將無辭以對，甚至要被迫冒著破壞與其它國家聯盟關係的風險，非得出兵助齊不可，未來潛在的外交風險可能較之「汶陽之田」帶來效益更大。所以齊國雖歸還魯地，不僅可能徵賦納貢無所不求，更使魯國成為齊國阻止南方吳人北進中原的前哨，齊國最終還是達到納魯為用的目的。原本欲以禮制齊，但魯國反為禮所制，以孔子的外交謀略，不可能不了解齊國返還「汶陽之田」之後對於魯國可能造成的影響。所以才有：「夫子雖欲不受，定公貪而受之，此違之驗。」一語。這也印證了現實主義理性自利是國家外交最重要的基本原則，而非道德原則。

三是魯國本就是弱君強卿，大夫擅權，若「汶陽之田」歸魯，則此一矛盾更形擴大，齊國更可藉此破壞魯國內部團結，離間孔子和魯君地位。如犁鉏也告訴齊景公「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迎之以重祿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榮其意。哀公新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魯。」⁷⁰因此夾谷會後其後兩年，齊國就展開外交攻勢，派遣美女與樂師到魯國，魯國執政大臣季桓子接受齊國的餽贈，孔子因此離開魯國。孔子在齊、魯兩國之間無立身之處，流離諸國，無法發揮其治國長才，而魯國也喪失了制衡其它強權國家的重要依憑。

由此可知，齊魯「夾谷之會」名義上雖是孔子以禮全魯，有效的抵擋了強齊的侵逼。但實際上齊國了解魯國政治上的弱點及孔子對於魯國的重要性，採取的一連串政治措施有效瓦解了孔子中興魯國所做的努力，最後更逼使孔子離開魯國，自此魯國國勢更形衰落，齊魯兩國權力的零和競逐表露無遺。

伍、「夾谷之會」的社會網絡分析

為了進一步探求夾谷之會中不同國家、人物及領地之間的往來易手的複雜網絡關係，筆者以《春秋三傳》及《國語》為文本，運用社會網絡分析方法進行分析。

⁷¹ 筆者首先針對「夾谷之會」中設定主要的關鍵字（包含人物和地點）「孔子、仲

⁷⁰張覺等著，《韓非子譯注》，上海：上海古籍，2012，頁296。

⁷¹ 所謂社會網絡分析主要是運用數學方法，透過人工語言和程式運算進行文字和資料的探勘以分析社會結構。主要以整體社會互動所產生的結構對於行動者的影響來解釋行為者的行動，而非針對行動者的內在屬性進行研究。並關注多個社會結構模式對於個別行動者的行為影響。社會網絡分析除在社會學研究領域內被運用之外，目前在犯罪防治、國際關係、族群及教育研究中被廣泛運

尼、魯、夾谷、龜陰、鄆、謹、齊、陽虎、晉、頰谷、齊景公、魯定公、晏子、晏嬰」以《春秋三傳》及《國語》做為文本進行檢索統計，並描繪出上述關鍵字的社會網絡圖：⁷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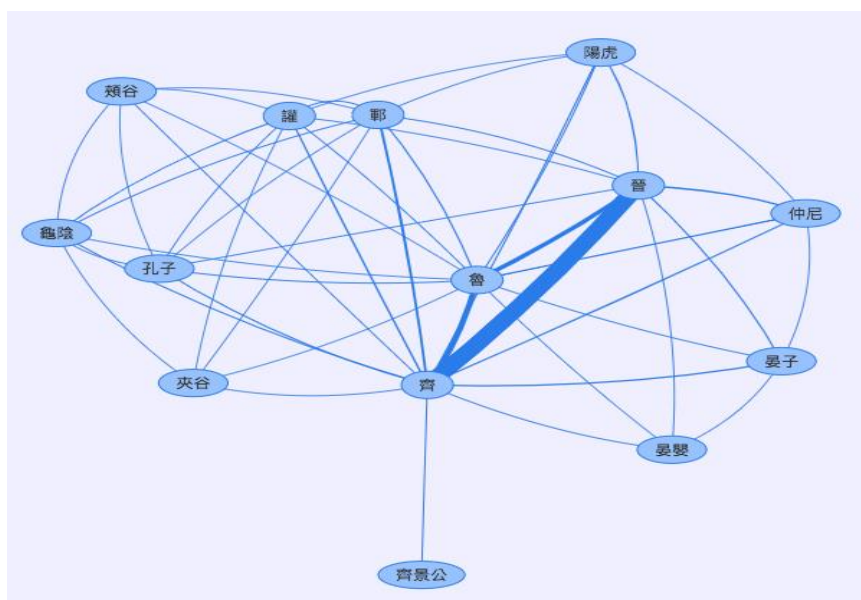


圖3 「夾谷之會」社會網絡圖

根據上述資料，筆者進一步導入網絡分析軟體「Gephi」進行模式演算，並以引力布局（Force Atlas）呈現網絡關係：⁷³

用。有關社會關係網絡的相關理論觀點和運用可參考 Wasserman, S., & Faust, K..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Carrington, P., Wasserman, S., Scott, J., & Peter J.. *Models and Methods in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Hafner-Burton, E. M., Kahler, M., & Montgomery, A. M.. "Network Analysi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3 (2009): 559-92.

⁷² 本圖繪製是以《春秋三傳》及《國語》為文本，導入「文本工具」（Text Tools）進行文字數據探勘並繪製網絡圖。相關運用及操作可參考「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應用程式介面」（CTP API）使用說明。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應用程式介面（CTP API）〉，《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站》，2006，2018.6.26，網址〈<https://ctext.org/digital-humanities/zh>〉。

⁷³ 「Gephi」是一款社會網絡分析軟體，主要是進行社會網絡資料的視覺化處理。而引力布局是其中的一種演算模組，主要是根據點和點之間的引力和斥力進行演算以確定每個點在網絡中的位置。有關「Gephi」的使用可參考劉勇、杜一：《網絡數據可視化與分析利器：Gephi 中文教程》，北京：電子工業，2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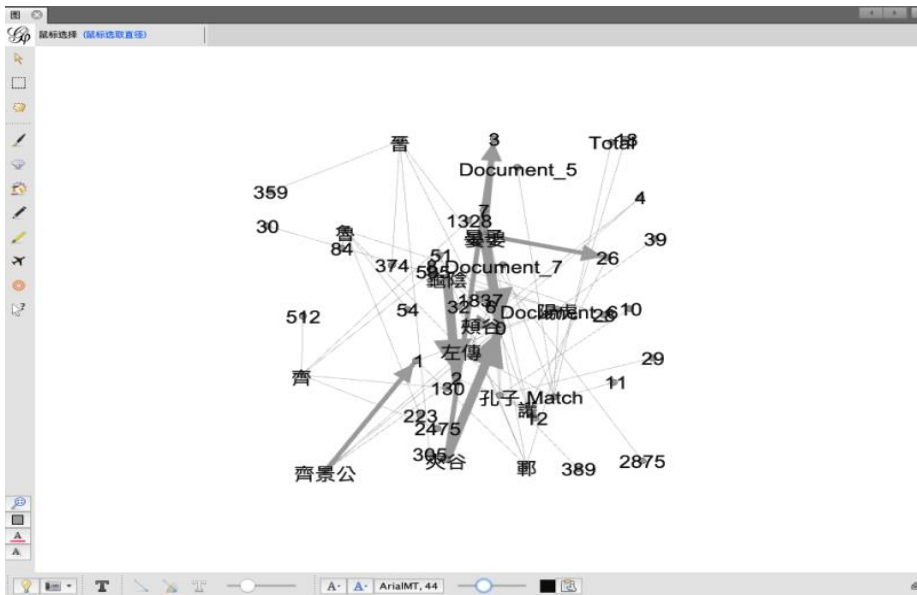


圖 4 「夾谷之會」「Gephi」運算圖

表 1 「夾谷之會」社會網絡關係統計表⁷⁴

ID	In-degree	Out-degree	Degree	Closeness centrality	Betweenness centrality
齊	2	11	13	1	13.25
魯	2	10	12	1	2.25
晉	7	2	9	1	6.333333
讎	6	3	9	0.8	2.583333
孔子	7	0	7	0	0
陽虎	2	4	6	0.75	0
賴谷	3	3	6	0.6	0
齊景公	1	1	0	0.541667	0
魯定公	0	0	0	0	0
仲尼	5	0	5	0	0
晏子	2	3	5	0.8	0
鄆	5	4	9	0.833333	2.583333
龜陰	0	7	0	0.70582	0
晏嬰	5	0	5	0	0

⁷⁴ 社會網絡理論中心性說明可參閱 Freeman, L. C.. "Centrality in Social Networks." *Social Networks* 1.3 (1978): 215-39。王光旭：〈社會網絡分析在公共行政領域研究的應用〉，《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第 34 期，2015.10，頁 67-134。羅家德、王競：〈社會網絡資料蒐集、測量與分析方法〉，《關係社會學：理論與研究》，邊燕杰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11，頁 205-23。Scott, J.：《社會網絡分析法》，劉軍譯，沈崇麟校閱，四川：重慶大學，2007。

從上述兩項數值分析，「夾谷之會」的社會網絡可以發現以下幾個重要的訊息⁷⁵。

一、社會網絡度數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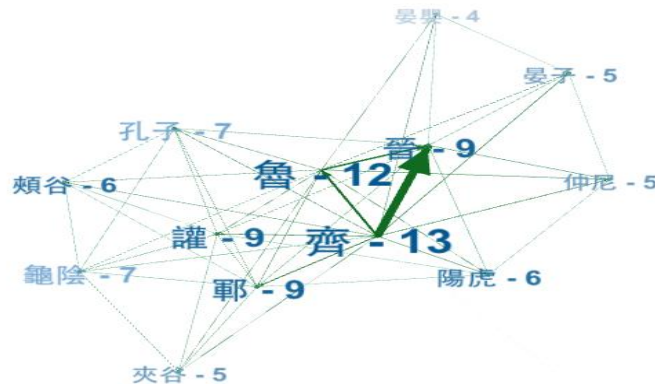


圖 5 「夾谷之會」社會網絡度數模式圖

由「夾谷之會」社會網絡度數模式的運算結果可知，「夾谷之會」的外交運作核心是「齊－魯－晉」三國的利益爭奪（三者互動關係最為密切集中，相互引力最強，且度數也最高）。特別是「齊－晉」之間的互動關係更是主要軸心，相較於魯國，齊國魯國展現更為積極的態度。一如前言所述，「夾谷之會」不單只是「齊－魯」兩國雙邊的外交事件，更是春秋時期霸權國家權力競逐的縮影，「汶陽之田」的往來易手也不過是齊、晉等霸權國家權力移轉的過程，相對弱勢的魯國其實並沒有置喙的餘地，對於魯國的外交未必有實質上的意義。

⁷⁵ 社會網絡統計圖中，所謂的度（degree）是指某個節點相關連的邊（edges）數目，如以有向圖（in-directed）而言，可以分為連入度（in-degree）和連出度（out-degree）。所謂連入度指的是連入該節點的邊的數目，而連出度則是表示從該節點連出的邊的數目。而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是指如果許多節點間最短距離路徑中都包含某一節點（即最各節點的最短距離的路徑經常包含該節點），說明該節點在網絡中較之於其它節點更有能力促進節點間通聯。在社會網絡中中介中心性高的行動者可以透過操控訊息的傳遞來影響群體的互動關係，並進一步影響決策的產出。王光旭：〈社會網絡分析在公共行政領域研究的應用〉，《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第 34 期，2015.10，頁 100。

二、連出網絡分析

而由「夾谷之會」連出網絡模式的運算結果可以發現，齊國在網絡中具有最高的中介中心性數值（13.25），表示齊國在「夾谷之會」互動網絡中的外交態勢最為積極（黑色影響大於紅字，而黑色（齊國）字愈深表示態勢最積極，灰色（魯國）次之）。同時齊國對於魯和晉兩國更是顯出單向的有向圖，表示齊國對於兩個國家採行積極的外交活動，而齊國對於魯國的影響更甚於對於晉國影響。再者，在「齊—魯—晉」的三方外交賽局中，魯國最有利的外交作為應是發展和晉國的關係制衡齊國，才能平衡齊魯之間外交失衡的情況，但圖中顯示齊國對於晉國外交關係的積極度更甚於魯國，因此魯國很難與齊國在此一三方外交賽局中競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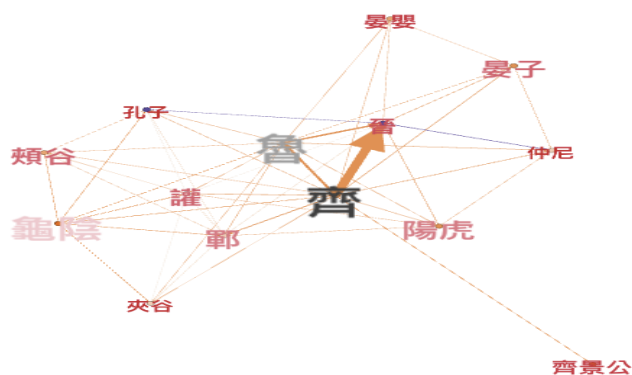


圖 6 「夾谷之會」連出網絡模式圖

三、連入網絡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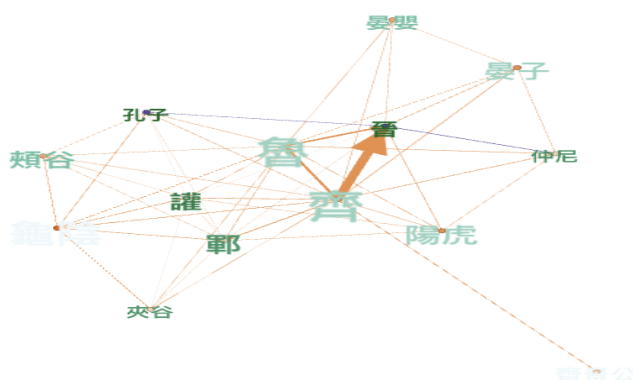


圖 7 「夾谷之會」連入網絡模式圖

最後由「夾谷之會」連入網絡模式的運算結果可以發現，孔子（仲尼）對於夾谷之會基本上是採行消極被動應對（顏色愈深表示愈消極應對，而非積極介入），而且完全沒有連出的情況。這也說明孔子個人對夾谷之會的結果並不抱持積極的態度，更無意在其中透過各種運作來獲得政治利益（相較孔子而言，陽虎和晏嬰的態度更為積極）。

從「夾谷之會」的社會網絡關係中可以發現，孔子依憑個人一己之力很難撼動齊魯之間長期形成的外交格局。魯國唯有以國家立場出發，採行更為積極的外交策略，結合外盟（特別是晉國），才有可能改變齊強魯弱的外交態勢。

陸、結論

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⁷⁶

在夾谷之會後，齊君採行犁鉏的策略，積極破壞魯君對孔子的信任，一連串「沮之、致地」的現實外交作為完全成功，最後孔子去魯，魯國至此更無力與強齊對抗。爬梳史籍記載和歷代學者的說法，「夾谷之會」孔子以義服齊或有其事。但考諸史實和政治現實，「汶陽之田」的歸魯，實際上對魯國並不是一如表面風光的結果，其背後更可能隱含了齊國對於魯國的外交謀略，及魯國可能為取得此地所必須付出的高昂代價。

春秋盟會在實際的外交意義上歷來受到相當多批評，各諸侯國不勤修政務，講信修睦，並不重視盟會在實際外交中的誠信本質，因此方盟即叛的事例極多，也因此很難將盟會做為穩固各國邦交的重要條件。如胡安國便認為：「盟者，《春秋》惡，屢盟以長亂，……是故《春秋》之志，在於天下為公，不以會盟為可恃。⁷⁷」這樣的觀點在夾谷之會中更是得印證。春秋末年禮義崩壞，宗法秩序或有可能發揮若干外交制衡的作用，但要全然以此取得實際上的外交成果實有困難。研究結果也回應本研究開始的問題意識，春秋末年各國在外交行為上愈來愈考量現實的政治利益，宗法禮制或道德政治或許只是獲得利益的方法或手段而非必要的依循原則。

⁷⁶ 司馬遷：《史記·世家》，王利器、張烈等譯注，臺北：臺灣古籍，2003，頁940-41。

⁷⁷ 胡安國：《春秋胡氏傳》，杭州：浙江古籍，2010，頁2288。

而從跨域整合研究的角度而言，在複雜的社會關係下，任何單一向度或是因素的詮釋都有可能陷入「見樹不見林」之憾。可考量應用不同理論視角和分析方法進行跨域的多元解讀，或能有不同啟發及收穫。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應用程式介面（CTP API）使用說明〉，《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網站》，2006，2018.6.26，網址〈<https://ctext.org/digital-humanities/zh>〉。
- 方永泉：〈科際整合〉，《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2000，2018.8.20，網址〈<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07655/?index=1>〉。
- 王光旭：〈社會網絡分析在公共行政領域研究的應用〉，《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第34期，2015.10，頁67-134。
- 王恩來：〈孔子相魯考〉，《理論界》，第2010卷，第1期，2010.1，頁131-32。
- 王琮瑄：〈由左傳交際涵養與外交辭令論「禮」——兼論交際失敗之例〉，《中國學術年刊》，第39卷，第2期，2017.9，頁27-52。
- 王肅：《孔子家語》，北京：源記書莊，1926。
- 半島網新聞：〈萊蕪發現首座魯長城，距齊長城遺址僅70公里〉，《半島新聞網站》，2009.5.11，2019.5.31，網址〈http://news.bandao.cn/news_html/200905/20090511/news_20090511_826698.shtml〉。
- 司馬遷：《史記·世家》，王利器、張烈等譯注，臺北：臺灣古籍，2003。
- 田軍：〈春秋時期齊魯關係概論〉，《山東教育學院學報》，第119期，2007.2，頁38-41。
- 石磊：《晏子春秋譯注》，哈爾濱：黑龍江人民，2003。
- 伍振勳：〈聖人敘事與神聖典範：《史記·孔子世家》析論〉，《清華學報》，第39卷，第2期，2009.6，頁253-54。
- 朱曉海：〈孔子的一個早期形象〉，《清華學報》，第32卷，第1期，2002.6，頁27。
- 朱熹：《朱子語類》，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臺北：中華書局，1986。
- 百度百科：〈魯長城〉，《百度百科網站》，2018.6.11，2019.6.31，網址〈<https://baike.baidu.com/item/魯長城>〉。
- 竹添光鴻：《左氏會箋》，臺北：古亭書屋，1969。
- 何休注：《春秋公羊傳》，香港：迪志文化，2001。
- 李隆獻：〈先秦漢初文獻中的「孔子形象」〉，《文與哲》，第25期，2014.12，頁24-25。
- ：〈左傳『仲尼曰』敘事芻議〉，《臺大中文學報》，第33期，2010.12，頁17-18。

- 杜預注、孔穎達疏：《四部備要·春秋左傳正義》，第 56 卷，臺灣：中華書局，1966。
- 邢業友、陳巨慧、劉程程：〈春秋魯長城發現之旅〉，《文化中國——中國網》，2011.11.15，2018.5.31，網址〈http://big5.china.com.cn/gate/big5/cul.china.com.cn/lishi/2011-11/15/content_4625373.htm〉。
- 胡安國：《春秋胡氏傳》，杭州：浙江古籍，2010。
- 胡楚生：〈陳岳春秋折衷論析評〉，《經學研究集刊》，第 6 期，2009.5，頁 87。
- 姚際恆：《姚際恆著作集——春秋通論》，林慶彰主編，臺北：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4。
- 范寧注，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
- 倪世雄：〈第六章〉，《當代國際關係理論》，臺北：五南圖書，2010，頁 217-65。
- 家鉉翁：《春秋集傳詳說》，第 158 冊，第 27 卷，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2005。
- 徐宗林：〈工具主義〉，《教育大辭書》，2000，2018.11.2，網址〈<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02185/>〉。
- 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香港：迪志文化，2001。
- 張端穗：《左傳思想探微》，臺北：學海，1987。
- 張覺等著：《韓非子譯注》，上海：上海古籍，2012。
- 畢經緯：〈論周禮在魯國的二元界定〉，《殷都學刊》，第 4 期，2011.11，頁 18-22。
- 陳捷：〈孔子之戰爭觀管窺〉，《先秦諸子與戰爭倫理》，羅秉祥編，香港：中華書局，2016，頁 109-38。
-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臺北：洪葉文化，1993。
- 葉至誠：《社會科學概論》，臺北：揚智文化，2000。
- 葛兆光：〈在歷史與解釋之間——對《谷梁傳》定公十年夾谷之會記載的詮釋史〉，《北京語言大學——中國文化研究》，第 1 期，2005.3，頁 6。
- 劉勇、杜一：《網絡數據可視化與分析利器：Gephi 中文教程》，北京：電子工業，2017。
- 鄭玉：《春秋闕疑》，吉林：吉林圖書集團，2005。
- 黎東方：〈中古上古史八論--齊魯交界地〉，《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4，2018.5.31。網址〈<https://kknews.cc/history/mmaq8gg.html>〉。
- 應劭：《風俗通義校注》，王利器注，臺北：漢京文化，2004。
- 薛向群：〈論春秋初期齊魯爭奪紀國的鬥爭及其結局〉，《學海》，第 2006 卷，第 6 期，2006.10，頁 206。
- 羅家德、王競：〈社會網絡資料蒐集、測量與分析方法〉，《關係社會學：理論與研

- 究》，邊燕杰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11，頁 205-23。
- 龐小霞、王芬、朱繼平、高江濤：〈汶河流域田野考察記〉，《中國考古》，2016.8.5，2019.5.31，網址〈<http://www.kaogu.cn/cn/kaoguyuandi/kaogusuibi/2016/0805/54952.html>〉。
- Scott, J.：《社會網絡分析法》，劉軍譯，沈崇麟校閱，四川：重慶大學，2007。
- Carrington, P., Wasserman, S., Scott, J., & Peter J.. *Models and Methods in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 Freeman, L. C.. “Centrality in Social Networks.” *Social Networks* 1.3 (1978):215-39.
- Hafner-Burton, E. M., Kahler, M., & Montgomery, A. M.. “Network Analysi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3 (2009): 559-92.
- Morgenthau, H.. “The Six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Realism.” *The Politics of Nations*. New York: McGraw-Hill, 2006. 4-16.
- . *Politics among Nations*. New York: McGraw-Hill, 1985.
- Wasserman, S., & Faust, K..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Abstract

In the traditional interpretation the Jiagu meeting of Qi-Lu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Confucius personally took the ritual and justice to protect the benefit of Lu as the main point of view. The author further examined the historical case by literary analysis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al political interests. I argue that the Jiagu meeting has a complex exchange of political interests and power struggles. The acquisition field of Wenyang is not entirely beneficial to the diplomatic interaction. The power balance between Qi and Lu, and Lu is more likely to lose more political interests in this meeting.

Keywords: Jiagu meeting,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Qi, Lu